

巴金与浙江文学: 文心相照,湖山为证

■ 郑绩

2025年是巴金逝世二十周年,在这一特殊节点重新梳理巴金与浙江文学的关联,既是对文学巨匠的缅怀,有助于深化对现代文学地域互动机制的理解,也能为当代文学传承经典、回应时代提供启示。

巴金与浙江文学的关系,是一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精神互动史。从地域根系的建立到文人群体的形成,从创作理念的相互影响到精神遗产的当代传承,二者之间形成了深刻的共生关系。这种关系不仅丰富了巴金自身的文学世界,塑造了浙江现代文学的精神特质,更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。

深层浸润:地域归属感内化为创作精神

巴金与浙江的文学羁绊,早已超越单纯的地理往来,形成了地域根系与文学场域相互滋养的深层关联。这种地域归属感并非静态的身份标签,而是通过持续半个多世纪的西湖漫游、文人交游与文学实践,逐渐内化为创作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现有研究普遍关注到西湖在巴金文学世界中的独特地位,学者李存光在《巴金传》中详细梳理了1930年代至1960年代巴金数十次杭州之行的文献记录,指出西湖不仅是其逃避都市喧嚣的休憩之地,更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。《巴金全集》中数十篇散文与书信提及西湖景致,从断桥残雪到九溪十八洞,自然山水不再是单纯的背景铺垫,而成为情感载体与精神象征。

在与萧珊的七年西湖闲游中,湖山景致与爱情记忆交织,形成《怀念萧珊》等作品中见景怀人的独特叙事模式,这种将私人情感嵌入地域空间的书写方式,被学者王瑶称为“巴金式的地域抒情传统”。1937年巴金与师陀、卞之琳等人在天香楼的聚会,不仅留下了“十年之约”的文坛佳话,更直接促成了屠格涅夫译作的分工计划,推动左翼文学与世界文学经典的传播。

1942年,陆蠡因营救战友被日军杀害,巴金在杭州与黄源、方令孺等人秘密举办小型追思会,追忆陆蠡的文学理想与人格气节。巴金在会上承诺要将陆蠡的故事写进作品,后在《怀陆圣泉》中详细记录此次追思场景,成为纪念陆蠡的重要文献。1960年代,巴金、萧珊与方令孺经常在杭州会面,相互慰藉,交流创作与读书心得,方令孺将自己的旧体诗手稿交巴金保存,巴金则为其修改散文初稿。方令孺总是去城站接巴金夫妻,过几天,又在城站的月台上与他们挥别。巴金与友人们患难相守,以精神互相守望,浙江文人社群成为巴金精神支撑的重要力量。

现在,巴金的手稿和塑像一直留在北山路上的江南文学会馆内,正是这段精神传承史的物质印迹。

1929年,巴金在上海与黄源初识,彻夜讨论鲁迅作品的传播与左翼文学的发展方向,二人交往持续半个多世纪,合作出版过《我们都是鲁迅的学生——巴金与黄源通信录》。



巴金手书“西湖永在我心中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浙江文学的地域特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巴金的创作风格。相较于川派文学的激昂澎湃,浙江文学自古便有冲淡平和的审美传统。

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巴金后期作品中日益增强的克制与温润,与西湖山水的熏陶及浙江文人的影响密切相关。从早期《灭亡》的激情呐喊到晚年《随想录》的沉静反思,这种风格转变在其与方令孺、黄源等浙江友人的交往书信中可清晰窥见,地域文化的浸润成为其文学成熟的重要助力。

文人交游:构建文人共同体,推动世界经典传播

杭州自古以来便是文人交游的重要场所,巴金在浙江的交游活动以文会友,构建起文人共同体,成为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。

1923年,时名李尧棠的巴金自成都赴上海途中,首次返回祖籍浙江嘉兴祭祖,停留约十日。期间走访破败的李家祠堂,接触嘉兴本地文人,听闻家族旧事与地方掌故,此行为其后来作品中寻根意识埋下伏笔,也是其与浙江地域文化首次深度联结。

1929年,巴金在上海与黄源初识,彻夜讨论鲁迅作品的传播与左翼文学的发展方向,二人交往持续半个多世纪,合作出版过《我们都是鲁迅的学生——巴金与黄源通信录》。

1935年,巴金在九溪十八洞与陆

蠡、丽尼、黎烈文同游。几人沿溪而行时约定共同分工翻译屠格涅夫作品,形成以翻译为载体的文化协作。

1937年巴金与师陀、卞之琳等人在天香楼的聚会,不仅留下了“十年之约”的文坛佳话,更直接促成了屠格涅夫译作的分工计划,推动左翼文学与世界文学经典的传播。

1942年,陆蠡因营救战友被日军杀害,巴金在杭州与黄源、方令孺等人秘密举办小型追思会,追忆陆蠡的文学理想与人格气节。巴金在会上承诺要将陆蠡的故事写进作品,后在《怀陆圣泉》中详细记录此次追思场景,成为纪念陆蠡的重要文献。1960年代,巴金、萧珊与方令孺经常在杭州会面,相互慰藉,交流创作与读书心得,方令孺将自己的旧体诗手稿交巴金保存,巴金则为其修改散文初稿。方令孺总是去城站接巴金夫妻,过几天,又在城站的月台上与他们挥别。巴金与友人们患难相守,以精神互相守望,浙江文人社群成为巴金精神支撑的重要力量。

现在,巴金的手稿和塑像一直留在北山路上的江南文学会馆内,正是这段精神传承史的物质印迹。

持续共振:讲真话理念的当代延续

进入当代语境,巴金与浙江文学的关联并未随时间褪色,反而通过文学遗产的活化与精神的传承,形成了与当代

浙江文学的持续共振。

江南文学会馆、巴金亭等物理空间的存在,成为文学记忆的物质载体,而巴金留下的精神遗产,则通过当代作家的创作实践得以延续与发展。

巴金“讲真话”的文学理念在当代浙江作家笔下得到鲜明延续与创新演绎。余华从《活着》到《许三观卖血记》,以冷静克制的笔触书写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生存困境,直面人性本质与生命真相,这种对真实的执着探索,与巴金《随想录》中直面历史、批判现实的“真话精神”一脉相承。麦家在《暗算》《风声》等作品中,通过谍战题材的独特叙事,挖掘特殊环境下人性的复杂与坚守,延续了巴金将个人命运与公共历史相结合的写作传统。此外,浙江文坛近年兴起的非虚构写作潮流中,《塘栖》《故园》等作品对地域历史与民间记忆的挖掘,同样是巴金“以个人经验映照时代”创作理念的当代实践。

巴金与浙江文人构建的“以文会友、互助担当”的社群精神,在当代浙江文学界仍具鲜活生命力。浙江省作家协会持续推动“西湖文学沙龙”“浙江青年作家研修计划”等活动,延续了当年巴金与友人的交流传统,为青年作家提供创作指导与交流平台。当代浙江作家群体普遍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,如艾伟在作品中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个体的精神困境,哲贵聚焦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人性博弈,均体现了巴金等前辈文人“文学为人生”的责任意识,彰显了文学社群精神的当代传承。

文学遗产的活化利用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代的重要纽带。浙江通过巴金主题展览、学术研讨等活动,整理了部分巴金与浙江文人的往来书信、未刊手稿等文献,为当代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支撑。由巴金故居与杭州师范大学图书馆联合主办的“薪传——鲁迅与巴金图片展”在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图书馆开幕,展览通过45幅图文版面、6幅画家作品及鲁迅手稿、巴金藏书实物展品,展示鲁迅与巴金的精神传承。展览开幕式上,杭师大话剧社的同学还演出了精心排演的巴金诗剧。这些举措不仅深化了对巴金与浙江文学关系的认知,更让年轻一代读者感受到经典文学的生命力。

(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)

格津是镣铐,还是诗的羽翼

■ 文韵平

近年来,古典诗词频频引发关注。《中国诗词大会》《经典咏流传》等诗词类综艺节目热播,吸引了一众拥趸。不久前,绍兴举办“放翁杯”诗词大赛,天南海北的人发来参赛作品;传统格律诗词。近日,大赛获奖作品公布……这都让我们真切看到,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受追捧。

随着传统格律诗词升温,多元化的观点频频碰撞。这些观点大致可分为四派:反对派,认为应淘汰格律诗词;保守派,认同经典格律诗词的鉴赏价值,但对其当代创作持怀疑态度;复古派,强调创作严格遵循古韵、古法;创新派,主张在遵守基本格律的前提下引入新题材、新思想、新语汇。

先表明立场,笔者赞同创新派。有关、有热度、有碰撞是好事,能促使我们更深入思考:格律诗词到底有啥魅力?应怎样用好这丰厚的文化瑰宝?

老古董过时了吗

格律,即格式、音律,是中国古典诗词创作的形式规范体系,涵盖平仄、押韵、对仗等要求。

格律诗起源于南北朝,成熟于唐代。随着白话文兴起,格律诗词如今已逐渐淡出日常写作。故此,反对派视其为“老古董”,主张将其淘汰。

格律诗词虽已不是“主角”,但只要有中国人在,它就不会消亡。作为文学星河中璀璨的明珠,其艺术魅力至少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——

统一齐整。每篇诗、词,字数都有严格限制,例如七言律诗每句7个字,共8句56字。词也称长短句,虽语句长短不一,但每个词牌的形式基本统一。

韵律优美。格律诗词平仄交替、押韵回环,且具有鲜明的节奏。“白日/依山尽,黄河/入海流。欲穷/千里目,更上/一层楼。”王之涣《登鹳雀楼》正是平仄交替的三字节节奏,“流”“楼”押韵,读来朗朗上口,唇齿生香。

对仗工整。“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。”(杜甫绝句)“斑竹一枝千滴泪,红霞万朵百重衣。”(毛泽东《答友人》)类似这样字数相同、平仄相对、词类相对的形式,营造出令人赏心悦目的对称美。

意境深远。要在相当有限的篇幅中表达丰沛的情感,须言有尽而意无穷。黄景仁《绮怀》便是一例:“几回花下坐吹箫,银汉红墙入望遥。似此星辰非昨夜,为谁风露立中宵。”一怀愁绪,几多感慨,尽付短短数句中。

试问:要淘汰这样的珍宝,岂非“崽卖爷田心不痛”?

为啥要遵循格律

反对派主张淘汰格律诗词,还有一个理由:格律是创作的束缚。

这种观点并非全错,格律的确不易掌握,但不能因为存在难度就否定。在一定之规下创作格律诗词,是“戴着镣铐跳舞”。纵然如此,在创作时,有些规则仍应坚守;例如诗词的句数、字数、平仄,押韵的位置,对仗的要求……

为什么有些规则不宜打破?并非刻板、守旧。在格律诗词长期发展过程中,先人发现一定规律并逐步将其固定下来,形成益于提升品位的“黄金定律”,例如平仄交替、讲究粘对。

平仄交替、粘对,通过长短、高低音的规律性循环,营造出抑扬顿挫的效果。遵守基本格律并非难以创作出优秀作品。毛主席诗词、王国维诗词、叶嘉莹诗词不就是明证吗?再往近处看,绍兴此次诗词大赛的获奖作品中也不乏佳句。有的感叹陆游:“徒存早岁胸中气,消释平生梦里冰。”有的描绘水乡:“一橹云霞入画屏,乌篷摇乱满天星。”……

既然眼前不乏佳作,那么,保守派对格律诗词当代创作的怀疑,就大可放下了。

今日新路怎么走

如果说反对派是个极端,那么,复古派则走入了另一个极端——他们严格遵循古法,唯古独尊,未免有些食古不化。

语言一直在发展变化,格律诗词创作为啥不能随之而变?

例如:“远上寒山石径斜,白云深处有人家。”(杜牧《山行》)唐朝时,“斜”读作siá(读音浊),和“家”押韵,今天看起未已不那么和谐。又如: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。”(杜甫《春望》)“别”在现代汉语中是平声字,和上句的“时”字似乎失对,但“别”在唐朝是入声字……

创作时,我们尽可按照现代汉语的平仄和音韵,但也应对古以来的变化有所了解。

相对于形式,更重要的是内容、精神内核应在传承中创新,借助格律诗词这个“旧瓶”,装入新时代生活的“新酒”。

提及创新,就难以绕开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。如今,只要输入指令,AI就能瞬间生成合乎格律的诗词“创作”如此便捷,“两句三年得,一吟双泪流”似乎已无必要。但AI“创作”更多的是词汇堆砌、格律填空,少了温度、情怀和积淀,总有点机器的冰冷感。

借助AI做一些辅助工作并非不可,但真正的创作没有捷径可走,还是要学习、积累、感悟……这正是叶嘉莹先生说的“兴发感动”。而这种质素,与我们的心性、品格、学养、经历,有密切关系。

“爱好由来落笔难,一诗千改始心安。”袁枚的诗句道出了创作的艰辛。今天,我们依然应秉承这样的态度,对优秀传统文化热爱而敬畏,在传承、发展中再创高峰。

(执笔 李建)

《三滴血》:黑色寓言中的罪与赎

■ 刘强

由康博执导,胡歌、文淇主演的《三滴血》无疑是2025年末中国影坛一部值得品读的作者电影。影片以“一滴寻亲,一滴赎罪,一滴绝杀”的冷峻命题,将镜头对准东北边境家族式人口贩卖的隐秘链条,讲述刑满释放的朱邵玉(绰号:驯鹿)为寻子深入犯罪团伙内部的救赎之路。该片以其冷峻的影像语言和深刻的人性叩问,在银幕上构建了一个关于罪与罚的现代寓言,也完成了一次黑色电影美学的本土化实践。

黑色美学的在地化实践

黑色电影是20世纪40~50年代兴起于好莱坞的电影风格,以犯罪、悬疑为核载体,视觉上以低光阴影、黑白高对比度、潮湿街道与昏暗室内为标志性意象,多刻画失意侦探、蛇蝎美人等边缘角色,有着强烈的悬疑吸引力,是电影史上风格鲜明、兼具思想深度与观赏价值的类型。其并非呈现黑暗本身,而是借由这份幽暗底色,审视人性的多面。进入21世纪后,它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土壤和电影产业环境中,经历了一场深刻的“在地化”转型,从单纯的类型模仿,演变为批判现实、刻画时代焦虑的重要作者表达,涌现出《白日焰火》《南方车站的聚会》《烈日灼心》《涉过愤怒的海》《坚如磐石》等一批优质电影。

康博执导的《三滴血》延续了这类电影的美学传统,并将其成功本土化。在历时五年的调研中,康博敏锐地捕捉到21世纪初社会转型期的阵痛。影片中那些低照度摄影、高反差影调、倾斜构图等表现主义手法,与荒寒景观相融合,创造出独特的视觉张力,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视觉修辞。茫茫雪原不仅是故事背景,更成为道德荒原的绝妙隐喻。摄影师超将零下三十摄氏度的惨白日光转化为叙事元素,人物在广袤冰原上的渺小身影,成为命运无常的视觉隐喻。

人物塑造上,胡歌饰演的驯鹿突破了传统黑色电影中硬汉侦探的单一形



《三滴血》剧照

格”的突兀段落。

艺术电影的困境与突围

《三滴血》的市场遇冷,折射出高度风格化艺术电影的生存困境。在短视频泛滥、观影习惯快餐化的时代,那些需要细品的形式语言和复杂人性描写,难以在短时间内征服观众。

然而,艺术电影的价值恰恰在于其对主流叙事的超越,对人性深度的开掘,对现实的多维度观照。正如黑色电影的本质并非对黑暗的沉溺,而是透过黑暗审视人性的复杂维度。《三滴血》对东北地域文化的呈现,对“家”的传统理念解构,都是值得肯定的尝试。黑色电影的未来,需要创作者在深耕本土文化土壤同时,还需借鉴类型片叙事智慧,在叙事技巧上精益求精,同时在主题挖掘上贴近当下的精神困境;在保持作者风格的同时,增强故事的可看性,以求在作者表达与观众接受之间找到更精准的平衡点。正如黑色电影大师罗伯特·布列松所言:“电影不是讲故事,而是用故事来建构。”

(作者系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教授、博士,硕导)

留白艺术与影像诗学

影片有意淡化情节的戏剧性,转而通过大量的留白和意象营造情感张力。那些被省略的人物前史,被刻意模糊的行为动机,反而为观众留下了丰富的解读空间。范超的摄影机善于捕捉细节的震撼力——床头烟头烫出的麻将图案、冰棍(高子淇饰演)只吃密封食物的习惯、变形金刚玩具的断臂,这些看似随意的细节,

却成为解读人物命运的关键密码。

声音设计同样参与叙事。影片中呼啸的风声、雪地的脚步声、老式火车的轰鸣,共同编织出一张声音的网,将观众牢牢笼罩在那种无处可逃的压抑氛围中。而当李棋在生产过程中的惨叫与人贩子打牌的喧闹形成对位时,声音的对比产生了惊人的批判力量。

叙事断裂与风格失衡

然而,《三滴血》也存在明显缺陷。多线叙事的结构导致情节衔接生硬,人物动机转变缺乏足够铺垫。如朱邵玉从利用李棋到帮助李棋的心理转变,因细节缺失而显得突兀。影片对风格化的过度追求,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现实主义的力度。部分冗长的空镜虽营造了冷冽氛围,却打断了叙事节奏,使观众情感共鸣屡屡受挫。

同时影片也暴露出康博导演在美

意融合上的青涩。黑色电影作为一种“情绪”和“风格”,其成功关键在于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。《三滴血》中那些刻意模仿《冰血暴》《南方车站的聚会》的桥段,虽视觉效果出众,却未能完全融入叙事本体,形成了个别“为风格而风

画个祥云就是国风了?

“国风”成为平面设计、动漫争相贴上的标签,但不少作品仅停留在符号的粗暴堆砌——图案必用祥云,背景必有松树、高山。创作者忽略了中式美学的内核在于意境与气韵,而非元素的简单叠加。这种对传统文化的“拿来主义”,暴露了创作上的懈怠,最终呈现的只是空洞的“国风”外壳。